

近十年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及新趋势

石 硕

[摘要]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新的趋势:第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第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第三,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别对这三个研究趋势的缘起过程、研究状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对三者所带来的康区研究的深化与进展作了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康区;民族走廊;康巴学;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12—00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的编纂与研究”(10&ZD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硕(195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藏族史、西南民族史。四川 成都 610064

藏族的居住地域传统上被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板块,三者既是藏语的三大方言区,也是历史地理区划。由于三者在地理环境、经济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类型等方面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使这三个区域之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及风俗习惯等均有所不同。对于这三大区域的差异及特色,19世纪成书的《安多政教史》中有一简约而精辟的概括“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人区。”^{[1](P.5)}按此归纳,则卫藏的特色是“法”即宗教,安多的特色是“马”即牧业,康的特色是“人”。这一点在藏族民间谚语中有更为直白的表达“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优秀的人来自康,最好的马来自安多。”另外,藏族民间谚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这些民间谚语体现了长期以来藏人在传统上对三大区域之特色的通俗的概括。总体来说,在藏人对三大区域特点的概括中,“卫藏法区”和“安多马区”相对较好理解,唯一较难理解的是作为“人区”的康。在藏人的眼中,康为何会成为“人区”?“人区”的含义是什么?如何从“人区”这一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康区的特点?这些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毫无疑问,对藏族三大区域之差异与特点的认识,是我们深入认识藏族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视角,也是全面理解藏族文化与社会的基础。就目前藏学研究而言,对“卫藏”和“安多”的研究

相对较充分,康区则因地域辽阔分散、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社会类型及文化多样等因素,学界对康区的研究仍处于相对薄弱状态。鉴于康区在藏区中所处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缘位置,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康区的人文特点就显得异常重要。

值得关注的是,近十年来,大陆学界有关康区的研究不但取得较大进展,而且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些新趋势——即研究视野的拓展及研究路径的改变——使康区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在康区研究上呈现的新趋势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第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第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第三,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拟就康区研究的新趋势及所带来的进展作一讨论。

一、从民族走廊角度开展对康区的研究

从民族走廊角度来认识康区并开展对康区民族的研究,是近十年康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与特色。

康区在地理上处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在康区地域自北向南纵贯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五条大江,形成一条条天然的河谷通道。这些河谷通道从远古以来就成为众多人群迁徙流动的場所,也是西北与西南古代民族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藏缅语民族(习惯上被称作“氏羌民族系统”)

即主要经这些河谷通道南下而逐步扩散于整个藏彝走廊和横断山脉地区。^[2]这一点近十年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康区民族的一个重要视角。2004年在康巴艺术节期间,在康定召开了以康区研究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坛”,此次会议出版的论文集即取名为《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3],这反映论坛的组织者已主动和有意识地将康区放在“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这一框架中来加以定位与认识了。

上述局面的形成,实与近十年来大陆民族学界对“藏彝走廊”的研究日臻活跃有密切关系。“藏彝走廊”的范围大体覆盖了川、滇西部及藏东这片辽阔区域,亦即处于横断山脉地带的所谓“六江流域”地区,藏彝走廊北部的主体区域即是康区,因此藏彝走廊研究成为推动从民族走廊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康区的一股强大推动力。2003年,在民族学界资深前辈学者李绍明先生的倡导下,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陕西等七省区的50多位学者汇聚于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举办的首次以“藏彝走廊”为专题的学术会议,其中有不少从事康区研究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4]这次会议可以说揭开了大陆民族学界新一轮“藏彝走廊”研究的序幕,2005年四川大学藏学所与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黄树民先生共同在成都举办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就开展藏彝走廊合作研究计划达成意向。2009年昆明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期间还举办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多样性·发展”专题会议。随着近十年藏彝走廊研究的不断升温,在此推动下,不仅拓宽了藏学及西南民族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同时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从民族走廊角度来认识和研究康区的新趋势。由于“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包括康区地域,故藏彝走廊的研究与康区研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交叉与重合,因此藏彝走廊研究不仅有力带动了康区的研究,同时也将康区的研究纳入到了民族走廊的视野之中。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效果,即使学者们开始改变过去单纯将康区看作藏区的一个区域板块的传统认识,而是开始更多地从民族走廊这一新的视角来关注和审视康区的民族互动及文化联系,具体说即是在康区研究中开始更多地关注民族之间关系、互动及文化联系。

近年来,在有关藏彝走廊的大量研究成果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均涉及到康区。其中从民族走廊角度进行康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李绍明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5];石硕的《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6]、《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7];曾现江的《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8];李星星的《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9],李绍明、刘俊波的《尔苏藏族研究》^[10];张云的《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11];杨曦帆的《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12];李星星的《蟹螺藏族》^[13]等等,这些成果的共同特点,即是把康区的民族及文化现象放在民族走廊的视角来加以探讨和认识,取得不少新的进展。如《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一书,从民族走廊角度对包括康区在内的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全面、系统探讨,梳理了唐以前康区的民族活动及其迁徙流动情况,特别是对康区藏缅语民族来源以及氏、羌、夷、越等演变源流作了细致的分析探讨,提出了认识唐以前康区民族源流演变的新框架。《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全面研究了明末清初蒙古势力向康区的扩张,梳理了元以来蒙古势力在康区的兴衰起伏及其对康区政治格局的影响,是近年康藏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一文对藏文文献中比较流行的“四氏族”、“六氏族”的传说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所谓“四氏族”、“六氏族”乃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各部落情况投射的观点,并深入阐述了包括康区在内藏区各氏族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吐蕃王族的关系。

此外,近年还有一批从民族走廊视角研究康区的项目也纷纷立项。如王海兵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边缘藏区的移民、开发与族际互动研究”、王正宇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川滇藏交界地区藏族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研究”、田茂旺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南路边茶之流动研究——藏彝走廊区域内的市场、权力与族群互动”等,这些项目均从新的思路与视野尤其是更多关注于族际互动来开展对康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应是受民族走廊研究角度的启迪。

总体来说,近十年来的康区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取向和问题意识上较之于过去有明显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藏彝走廊研究角度的影响。

二、“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近十年来康区研究出现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势,是“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2004年

在康定召开的以康区研究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坛”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杜永彬研究员提交了一篇题为《康巴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的论文,此文有一个导论,标题是“康巴文化与康巴学”。这篇简短的导论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曰“康巴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及其在藏族文化史上的地位”;二曰“康巴学是中国藏学的有机组成部分”。^[3]此文是大陆学界首次提出“康巴学”这一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在“康巴名人论坛”上,“康巴学”的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讨论,以资深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康巴学”概念予以了积极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一批甘孜藏族自治州内学者的积极响应。与会学者对此概念进行了热烈讨论,尽管对“康巴学”概念能否成立存在不同意见,但与会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有积极的学术意义,至少可以进一步推动康巴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此共识之下,有关“康巴学”的讨论进一步得到延续,并陆续发表了若干专门讨论“康巴学”概念的论文,主要有:李绍明等《康巴学简论》^[14],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15]、杜永彬《“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6]。此外,从2006年第2期起《康定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已更名为《四川民族学院学报》)还专门开辟了“康巴学”栏目,相继刊载了戴刚《试论康巴文化与建立康巴学研究》、林俊华《关于康巴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贺先枣《试谈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的意义》、陈光军《试论建设科学的康巴文化研究学科体系》等文章。这些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康巴学”概念的内涵、特点及价值进行了讨论,并在藏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并非偶然,而是有其重要背景。这个背景,从总体上说,即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康巴的重新“发现”——即对康巴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特点及特殊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认同度得到迅速提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区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大型调查研究活动。1982年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即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考察范围大部分集中在康区,考察成果有《滇藏高原考察报告》、《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等,均属康区研究。此次大型考察活动揭开了新时期学术界从整体角度看待和认识康区的序幕。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康巴地区开展的各项专题研究也日益升温,如有关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研究、茶马古道研究、《格萨尔》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以及近十年来日益兴起并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界广泛关注的“藏彝走廊”研究。这些研究大大加深了学术界对康区民族特点与地域文化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康巴地域文化的研究,也使康区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更广泛的关注与重视。在此背景下,一些以康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也纷纷成立,如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康区的“康藏研究中心”,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了以研究藏族为主的藏学研究所,四川凉山州也成立了“藏学研究会”,这些机构的成立使得川、滇、藏三省区的康区研究迅速升温。此外,近十余年来,随着康区对外开放力度增加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有“香格里拉”美誉的康巴地区以其独具魅力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吸引了大批中外旅游观光者,“康巴”一词也不胫而走,康巴这一神奇魅力之地正在撩开它神秘的面纱,成为一块愈来愈吸引世人目光、令人向往的西部热土。

此外,“康巴学”概念的提出,还迎合了康巴地区人民和各级政府加快康巴社会发展,实现产业转型的客观需要的现实背景。自1998年长江上游天然林全面禁伐及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天然林保护工程后,康巴地区过去以“木头财政”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一度走入困境,面临新的选择,在此背景下,旅游业正日益成为康巴地区一个替代性的新兴支柱产业。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川、滇“三州一地”联袂举办的“康巴艺术节”,即是发展康巴旅游的一个重大举措。而康巴文化的独特性是康巴旅游的重要支撑,康区旅游发展的需要同样迫切地提出了如何认识康巴文化及人文特点的问题。2004年在康定举办“第四届康巴艺术节”暨“中国甘孜·香格里拉国际旅游节”期间,同时召开以讨论康巴文化为主题的“康巴名人论坛”,就正好反映了康区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拓展和深化康区研究的迫切需要。所以,康巴研究的迅速提升以及“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既是以自身极具特点的自然与人文为基础,也有康区研究逐步深入、扩大及其研究价值日益受到肯定与重视的学术背景,同时还有将康区作为“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建设”所产生的现实方面的迫切需要。

三、清末民国时期康藏史成为研究热点

近十年,康区研究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趋势,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取得较丰硕的成果。

康区地跨川、滇、藏、青四省区,西接卫藏,北连安多,地域上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自古以来是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地带,也是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藏的前哨和依托之地。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致使全国震动,在此背景下清廷提出“固川保藏”方针并开始了对康区(时称“川边”)的大规模经营。从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办学和兴办实业,到尹昌衡西征,从三次康藏纠纷到西康建省,整个清末至民国时期康区始终成为多种势力竞相角逐的风云之地,发生许多波澜壮阔且牵动全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在建国以后由于民主改革及文革等原因,清末民国时期的康藏历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段历史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十年来,清末民国时期康区历史逐渐成为康区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但藏学界的学者对这段历史予以了更多关注,许多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也纷纷从不同视角投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而使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这是近十年康区研究中出现的又一个新的趋势与特点。

近十年来,有关清末民国康区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且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康区社会各个方面。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是对清末康区改土归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书立足于大时代背景,详细考证了清末在康区改土归流的缘起、过程及所包含的历史合理性。^[17]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一书,分清末、北洋政府和民国时期三个阶段研究川、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探讨康区在近代川、藏关系中的作用,深化了对近代康区政治地位的认识。^[18]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和《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均为专题论文集,内容广泛涉及近代西藏及四川康区的政治、文化、民间宗教、经济诸方面,在许多个案研究上均有所开拓和深化。^[19]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任新建《夙全与巴塘事变》^[20];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年)为例》^[21];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22];何一民《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23];黄天华《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24];卢梅《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25];王海兵《西康

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年)》、《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26];吴建国《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现代化》^[27]等。

涉及近代宗教研究的成果有:徐君《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28];王川《清代西藏地方的瓦合山神崇拜考述》^[29]等文章;赵艾东《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角色》等文章^[30];范召全、陈昌文《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1928-1948)变迁研究——兼论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和西康早期现代化》^[31];邓前程《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32]等等。

涉及近代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西藏研究》和《中国藏学》近年来刊登的相关文章中,如美朗宗贞的《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刘正刚等的《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清前期藏区驻军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李刚、郑中伟《明清陕西商人与康藏锅庄关系探微》;刘祥秀、郭平若《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曹必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等等。

涉及教育方面的研究论著有:徐君《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33];严奇岩《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34];刘先强《民国时期康区的民众教育发展》、《试论清末川边藏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35]等文章。

除此而外,近年涉及康藏史研究的立项成果还有:吴建国于2006年立项的国家民委社科项目“西康史研究”,该项目重点研究民国时西康省历史,但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出版。徐君主持的四川省社科项目“近代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研究”(200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碰撞与交流:基督教在藏区传播研究”(2005年)两个项目主要致力于近代基督教在康区传播的研究。赵艾东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外国人在东部藏区的活动与中西文化交融研究”(2008年)主要研究近代外国人在康区的活动以及康区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已发表多篇相关论文。黄天华主持的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研究课题“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2008年)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地区为考察中心”(2010年),将西康建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置于国家与边疆关系、政治整合与国家统一的视角加以研究。邓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督教与民国时期川

康民族地区地方疾病防治研究”(2008年)、四川省社科项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2004年)、“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的初步发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医疗卫生服务个案研究”(2006年)等。

从上述论著及相关研究项目看,近十余年来,清末民国时期康区史正在成为康区研究的一个热点,且研究角度、议题及问题意识呈现出日渐丰富和多样化的趋势,个案研究亦呈深化趋势。

四、新趋势带来的康区研究的深化与进展

在藏区三大板块中,康区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地理人文区域。但是,由于康区在区位上处于藏区之东南部边缘地带,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交通相对不便,在以宗教为重并有着朝圣传统的藏族社会中,康区在藏族眼中一直被定位为“边地”^①。这种情况,也正是造成长期以来人们对康区的认识与研究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状态的原因。

然而可喜的是,近十年在康区研究上出现的三个新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康区价值的新“发现”。这一“发现”不但大大提升了学界对康区的总体认识,也为康区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更广阔的前景。特别是将康区置于历史民族走廊的框架中来加以认识,至少给康区研究带来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在康区藏族与西南各藏缅语民族渊源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康区是藏族与西南众多藏缅语民族交接与互动的地区,这也是康区不同于卫藏和安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康区,藏族与众多西南民族交错毗邻而居,彼此在生活方式及观念信仰等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在文化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与民族走廊中长期的民族互动与交融以及民族的历史发展源流息息相关。事实上,只有将康区置于民族走廊框架中来认识,才可清晰地呈现康区藏族与西南各藏缅语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从而比较深刻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康区藏族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近十年来,从民族走廊角度深入探讨康区藏族与西南各藏缅语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的著作如《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等,均从民族走廊角度涉及到康区藏族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并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第二,深化了对康巴地域文化内涵、特点及价值的认识,并促成了“康巴学”概念的提出与探讨。

将康区置于民族走廊的框架来认识,对康巴藏族与西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也大大提升了学术界对康巴文化内涵、特点及价值的认识。近十年来,人们已开始充分认识到康区地域文化的复合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康巴文化是“以藏文化为主体,相容汉文化、纳西文化、羌文化等其它民族文化的多元复合性的地域文化”^{[36] P.94)},此看法已改变了过去将康区文化单纯定位为藏族文化的观点。这一定位也意味着康区研究的范畴除了康区地域的藏族主体文化外,同时在研究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方面也极具特色和典型意义。

由于从民族走廊的视角来看待康区的民族与文化,使得人们对康区文化的多样性特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格勒所指出“在一个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多种文化经济交流相融的人文环境中,形成了康巴文化的宽宏、开放、兼容性的特点。”^{[37] P.7)}任新建也说“在康巴文化中人们才能真正看到藏族文化的繁多彩,才能真正体验到人类文化多样性与交融性的一致,才能真正感悟到‘香格里拉’的意境。”^{[36] P.111)}他认为“康巴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的‘香格里拉’理念和集勇敢、坚韧、精进、博爱、乐天、睿智为一体的格萨尔人文精神。”^{[36] P.94)}他将康巴文化的精髓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无疑是对康巴文化之本质的一种洞见。2003年费孝通先生在写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也指出,在藏彝走廊区域“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4] P.2)}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人们普遍和深刻地意识到康区地域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特点,才最终促成了“康巴学”概念的提出。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加强对康区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交融的特殊藏族区域的研究,不但对藏学有重要贡献,同时对于认识和理解当今世界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发展乃至如何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等人类所关心的重要主题,同样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与意义。

另一方面,随着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成为研究热点,特别是研究的层次、角度不断丰富,宏观及微观研究不断深入,也进一步扩大了认识康

区社会的视野。我们相信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这段历史仍会成为研究热点,并且将会成为康区研究的重要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增长点。清末民国时期的康区史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与边疆政治关系之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对康区作为藏、汉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汇与连接地带,尤其是在连接西藏与内地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作用方面也会带来更加深刻的认识。

注释:

[1] 藏语“康”(Kham)的含义,据更敦群培《白史》解释“总合之东方地区,……所言康者,系指其边地,如边属小国‘康吉贾阵’(Kham kyi rgyal phra)也”。参见更敦群培著 格桑曲批译 周季文校《更敦群培文集精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参考文献:

- [1] 智巴丹·贡却乎丹巴绕吉. 安多政教史[M]. 吴均等译.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 [2] 石硕.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看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藏彝走廊的迁徙[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0).
- [3] 泽波 格勒主编.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C].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4] 石硕编. 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 [5] 李绍明.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6] 石硕. 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7] 石硕. 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 [8] 曾现江. 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以蒙古族为中心的历史学考察[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 [9] 李星星. 长江上游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0] 李绍明,刘俊波编. 尔苏藏族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1] 张云. 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问题[A]// 郝时远,罗贤佑主编. 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 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 [12] 杨曦帆. 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13] 李星星. 蟹螺藏族[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 [14] 李绍明,任新建. 康巴学简论[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 [15] 石硕.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J]. 西藏研究,2006(3).
- [16] 杜永彬. “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3).

- [17] 马菁林.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 成都:巴蜀书社,2004.
- [18] 吴彦勤. 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 [19] 王川. 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王川.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任新建. 凤全与巴塘事变[J]. 中国藏学,2009(2).
- [21] 徐君. 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楨督川十年(1876-1886年)为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2).
- [22] 郎维伟.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J]. 民族研究,2005(4).
- [23] 何一民. 20世纪初年川边藏区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述论[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6).
- [24] 黄天华. 抗战时期川康两省的社情与民情(1939-1942)[J]. 民国档案,2007(1).
- [25] 卢梅.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J]. 民族研究,2008(5).
- [26] 王海兵. 西康省制化进程中的权力博弈(1927-1939年)[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3);王海兵. 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J]. 安徽史学,2007(6).
- [27] 吴建国. 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现代化[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3(3).
- [28] 徐君. 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探析[J]. 史林,2004(3).
- [29] 王川. 清代西藏地方的瓦合山神崇拜考述[J]. 民族研究,2006(3).
- [30] 赵艾东. 美国传教士史德文在1917-1918年康藏纠纷中的活动与角色[J]. 西藏研究,2008(6).
- [31] 范召全,陈昌文.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地区宗教样态二十年(1928-1948)变迁研究——兼论民国政府宗教政策和西康早期现代化[J]. 世界宗教研究,2010(4).
- [32] 邓前程. 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J]. 民国档案,2006(3).
- [33] 徐君. 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J]. 中国藏学,2007(2);徐君. 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2).
- [34] 严奇岩. 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J]. 民族研究,2006(6).
- [35] 刘先强. 民国时期康区的民众教育发展[J]. 教育评论,2008(1);刘先强. 试论清末川边藏区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J]. 民族教育研究,2006(1).
- [36] 任新建. 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A]// 泽波 格勒主编.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C].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 [37] 格勒. 略论康巴人与康巴文化的特点[A]// 泽波 格勒主编. 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C].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2011-09-20 责任编辑 李克建